

干部书架

探寻中国道路的文明史意义

——读《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丁国栋



吴新文等著《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世界化的进程统一起来进行审视和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对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景进行了展望，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统一中探寻中国道路的文明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理论，也是充满活力的文明再造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先进文化形态，是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是人类文明活的灵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的历史过程，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理论，也是充满活力的文明再造理论。《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一书指出：“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明，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处俄国，大成于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并开始彰显其世界意义，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深层次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板块式拼接，不是积木式地叠加，不是物理式混合，而是化学式反应，生物

式融合。（见陶文昭等：《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观念中获取启示》，《北京日报》2015年11月16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它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深层力量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吸纳性。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了人类优秀哲学思想遗产，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完成”或“终结”，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历史上，中华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卓越贡献。中华文化是包容文化差异、吸纳外来文化的共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气魄。陈来说：“中华文明赋予我们独特世界观和处理复杂事变的能力，这是支撑一个大文明数千年发展的内在力量，对未来也大有启发。”（陈来：《当代如何焕新传统》，《人民日报》2018年2月23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重塑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动融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长期执政的思想资源，形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强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力量

历史文化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与中国智慧的共同结晶，它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

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一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样式，既结合了中西方文明的长处，又避免了它们的很多不足。”

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文明复合体，是肩负时代使命的文明主体。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扎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汲取历史智慧，吸收文化养分，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创造“中国之治”的新辉煌。历史维度和时代维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取向，只有深刻诠释好这两个维度，才能够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贯通中，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将文化基因转化为文化自信，从而占据文明和价值的制高点。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特殊性首先是历史极其悠久，“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世界性影响。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说：“至少到18世纪末，欧洲接受来自中国的影响是因为他们视中国文化为更优越的文化，且乐意向中国借鉴。”中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内生演化、积淀传承过程，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成为我们的生活和血脉。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现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的精神图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的同时，注重从人类文明历史经验中把握治国理政规律，将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与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美国学者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说：“不是种族塑造了

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文明和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性的文明，具有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向往天下大同，倡导和合理念，主张兼容并包，强调多元共生，是反对“文明冲突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中的天下意识、人类情怀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集中体现，对于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推动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再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梦想。李大钊曾经呼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梁启超说：“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文明再造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紧密相关，是渐进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是正在走向成熟的新的文明形态。《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理论。它虽然产生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明、追求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视野。”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长久性意义的文明理念，将之创造性转化为我们面向未来、思考世界的思想资源，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影响我的一本书

《苏东坡传》：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程良胜

苏东坡已逝去千年了，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他的诗、文、词、书、画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林语堂先生以“以此为乐而已”的潇洒放松心情，却又耗时十余年之久用英语写成《苏东坡传》，实为呕心沥血之作，成为人物传记的不朽名著，又由学者教授翻译成中文（有两个译本）得以广泛传播。“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诗文书画传千古”是苏东坡一生的写照。林语堂先生用如椽大笔描绘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波澜壮阔的一生，概括起来就是屡遭打击、初衷不改，历尽坎坷、笑对人生。这就是我读《苏东坡传》的收获和启示。

为人，有公敌，无私恨。苏东坡一辈子都是以诗文闻名、以诗文惹祸，但他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常常躺着中箭、无辜受辱。新党当政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旧党上台时，他因反对全盘否定变法而被诬告陷害，遂主动请辞外放；新党复起，他又首当其冲被贬。他在新党与旧党的倾轧中一贬再贬，却因诗文书画名声越来越大。一个人的名声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苏东坡的政敌佩服他的诗词文章，却畏惧他名声的力量。苏东坡越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典型如新党代表人物章惇当上宰相后，一再打压他。被贬的地方一次比一次偏远、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意在让他永无出头之日。但苏东坡始终乐观面对，不屈不挠，不失人生快乐，令政敌烦恼，甚至无可奈何。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别人，顶多是不喜欢，他曾对弟弟苏子由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对以前章惇施加的迫害丝毫不挂怀，寄信宽慰章惇及其亲朋，还抄录药方助其养生益寿。诚哉君子，如是也！

为文，自乐而乐人。苏东坡的快乐是写作时的快乐，而他的作品也使读者快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谈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事实也是如此。

名人与读书

朱子读书法

■宣金祥

很多人知道朱熹是南宋的大学问家、大教育家，但却未必知道他同时还是一位读书方法论专家。

朱子论述读书方法的独到见解主要是在《朱子语类》的《读书法》和《总论为学之方》中。在这里，朱子不仅以自己治学之道现身说法，还总结了荀子以来历代学者的读书心得。语言明白晓畅，读来极为自然亲切，不乏启迪作用。

朱子说，读书要能“先入得其书”，要有耐心和虚心。“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表面上看，这是最笨的，其实却是千古不易的“不二法门”。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应是读书真正意义之所在。若只将其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或不假思索地猎取一些“见识”，那至多只能算“看书”，称不上“读书”。“读”作为一种高级思维活动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去“拿”的。

他们说现在是在信息时代，古人所谓

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的新作时，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说，每逢皇上举箸不食时，必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皇上越是感叹赞美，苏的政敌越是千方百计加害于他，必使神宗在世一日，苏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入朝。这种感染人心的力量来自苏东坡独特的作文之道。他自述为文之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自论其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归根结底在于不失本真，赤子情怀不改，狂放不羁不改，不矫揉不造作，不屈从不盲信，畅所欲言，至真方得至乐。

为情，情真而意笃。一生漂泊，故乡、亲人、朋友都是苏东坡抒写的主题。“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怀念亡妻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思念兄弟的。他用真性情赢得真朋友，他的朋友有名妓、有诗僧、有除酒他喝的老妇、有无名的道士……在人生落魄低潮之时，身边仍有朋友相伴。道教奇人吴复古、陆维谦曾与他同住数月，并充当其家人千里传书的信使。

为政，胸怀百姓，心系苍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无论被贬到哪里，苏东坡除了于自然山水中得到慰藉，怡然自乐，享受刹那间宁静而又飘忽的感受之外，他心中也始终牵挂着黎民百姓。在黄州也好，苏州也好，雷州也好，琼州也好，苏东坡始终与百姓融为一体，他常常与他们席地而坐，相谈甚欢。每到到一个地方任职，他都会倾注心血和汗水，留下足迹和传奇。苏东坡曾两次到杭州任职（第一次任通判，第二次任知州），对杭州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活人无数；他疏通运河，挖渠凿井，用瓦筒引水，实现了“西湖甘水，殆遍一城”；他开浚西湖，挖山筑堤，为后人留下“何处黄鹂破晓烟”的苏堤，与“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白堤交相辉映，成就了西湖的壮美景观，如今苏堤成为杭州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公元1101年，一代旷世奇才苏东坡病逝于常州，像清风一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享年64岁。

（作者单位：湖北省咸宁市纪委监委）

读经典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胜

最近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感慨万千。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40周年之际，人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对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1992年2月12日视察上海时所指出：“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首先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关头，“两个凡是”背离这个基本原则，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究竟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用什么标准判定历史的是非，用什么尺度衡量工作的得失？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时感慨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

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的激烈争论，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看来，不确立实践标准，就难以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无从谈起。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还在于它关系到政治路线能否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且是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的两个方面。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就接连说了两个“最起码”：指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谈起实践标准时，总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1979年7月28日，他听取山东省负责人汇报时指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8月9日，他听取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时又说，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基本建设”与“思想基础”，道出了实践标准硬在何处。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表现为它是“唯一标准”，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为走好自已的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好贯彻好实践标准，并提出与之内在统一的现代化标准、生产力标准等。特别是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

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次视察中，他还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是看实践”“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等论断。可见，实践标准之“唯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贯穿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一个故事。1985年7月30日，邓小平会见泰国国会代表团，谈到自己的工作情况和身体情况时说：“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体力还可以。”故事虽小，学问却大，足以体现实践标准在这位“实事求是派”心中的分量。而今，我们纪念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要像邓小平这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标准，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切实贯彻落实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